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广东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岭南晚清文学研究

管林 陈永标 汪松涛
著
谢飘云 左鹏军 闵定庆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岭南晚清文学研究

管林 陈永标 汪松涛 著
谢飘云 左鹏军 闵定庆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晚清文学研究 / 管林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11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ISBN 7-218-04424-7

I . 岭… II . 管… III . 近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广东省
IV . 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8345 号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1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424-7/I·610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公司联系调换。

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对晚清文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然而发展极不平衡。在国外，一般来说，研究晚清小说的著作和论文较多，日本、美国、俄国、加拿大、韩国、法国、捷克、德国等均有学者研究晚清小说，日本还定期出版《清末小说》专刊。1991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首届中国近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提交的论文，也全是关于晚清小说的。国外对晚清诗文、戏曲和文学理论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却非常少。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后，研究晚清文学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的范围，也逐步由微观走向宏观，并且涉及到晚清诸文体和许多重要作家，还出版了好几部中国近代文学史，它们论述的时间范围，主要也是晚清时期。但分地域来研究晚清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罕见的。进入90年代以来，除了有几部中国近代文学通史问世外，还有多部专史出版。如黄霖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谢飘云的《中国近代散文史》、欧阳健的《晚清小说史》等。与此同时，不少学者转入对晚清区域文学的研究。1993年，上海首先推出了区域文学研究的硕果，出版了陈伯海、袁进主编的《上海近代文学史》。隔了两年多，广东也拿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成果，于1996年初出版了钟贤培、汪松涛主编的《广

东近代文学史》。其他不少地区，也陆续发表了对晚清本地区文学进行研究的论文或有关专著。

前几年出版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是区域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包含了广东晚清文学的内容，而且还覆盖了民国初年的文学。全书史中有论而以史为主。我们这部《岭南晚清文学研究》，在内容方面，不包括民国初年的文学，在地域范围方面，包括整个岭南地区，即今天的广东、海南、香港、澳门和广西的一部分地区。我们希望对岭南地区的晚清文学作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摸清岭南晚清文学的概况，寻求岭南晚清文学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分析这些特点形成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全书论史结合，以论为主。

本书各章节的安排，力求做到：由外及内，内外结合；由全局到局部，再由局部到全局；由面到点，点面结合；由感性认识到理性概括，突出重点和特点。

第一章从考察岭南文化之渊源以及晚清岭南社会文化心理之变异入手，指出中原传统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母子”关系，岭南文化与母胎文化，既有承传的基因，也有变异的因素。这变异的因素，历经千百年岭南地理、历史、文化的孕育，至鸦片战争前夕，已具有不完全相同于中原传统文化的内在素质。如“学贵知疑”和“务求自得”的学风，经世致用和提倡实学的文化价值观念，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重商传统和文化平民性的增强。鸦片战争以后，岭南人民在新的时代精神感召下，面对迫于眉睫的救亡图存的任务，在汹涌东来的西学浪潮中，得时代风气之先，弄潮儿被推上潮头浪尖，使岭南文化终于由中华文化中的非主导型文化，逐步成长为近代中国的主导文化。浓厚的务实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思想，强烈的

民族意识和不屈的战斗精神，兼收并蓄、博取众长的开放性，勤于探索、变革求新的勇气。这些较为先进的文化品格，不仅对中国近代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滋养了岭南晚清文坛，孕育和培植了岭南晚清文学。本章从宏观的角度，将岭南晚清文学置于岭南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心理背景下，加以考察，概括出它的特质，即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开放性、平民化等。

第二章紧承第一章的第三节，进一步从宏观方面，论述岭南晚清文学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特征。勾勒出它经历了反封建文学的崛起、文学开始走向世界的祈求与探索、文学改革大潮的兴起，以及文学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高扬等四个阶段的轮廓。这一章还从晚清文学的作者、作品的题材与风格等方面，概括出它的基本特征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文学创作本体的深化；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创作鲜明的时代精神；雄直雅健、悱恻清幽的文学风格；报刊文体与华侨文学的兴盛；作家群与文学实践的多元化。本章最后，在充分肯定岭南晚清文学的价值取向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负面效应。

第三章是对晚清岭南文学的具体描述。这一章我们不侧重于文学史式的纵向叙述，而是按文体着力于作横断面的剖析。在诗歌方面，指出了晚清前期传统诗歌的新变，并肯定了它的贡献，重点评价了晚清后期的维新派诗人和南社诗人。至于岭南词坛，自乾嘉以后，已日益兴盛，至晚清更是名家辈出，形成一支可与江左、中原相抗衡的“南天劲旅”。本章第三节对粤东词派和临桂词派作了较详细的评述。晚清岭南散文也空前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的局面。近代报刊在岭南的发育成熟，促使香港、广州等地开风气之先，创立报刊文体，

领先于全国；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维新文体迅速风靡全国，开启民智，为维新张目，而且为文体革新、实现古典文体的近代转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章第四节，以时间先后为序，介绍了岭南传统散文及其新变，早期报章体和维新派散文，“新文体”的创新，民主主义革命家的散文，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晚清岭南散文发展的三个特点。第五节小说新境界的开拓，着重介绍“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吴趼人与社会谴责小说，黄世仲、苏曼殊等革命派的小说，指出晚清岭南小说创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

如果说第三章是对晚清岭南文学作整体性的、全面性的评述，那么第四章则是对晚清岭南文学作局部的、重点的介绍。在晚清出洋大潮中，闽粤两省出洋的侨民最多。特别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一带、潭江流域的“四邑”地区、潮汕平原和兴梅山区，出洋谋生的人更是数以万计。反映华侨出洋以及出洋后的生活和遭遇，诉说在家侨眷的痛苦与喜悦，就成了晚清岭南文学的一大特色。本章重点介绍了容闳、黄遵宪、吴趼人、梁启超、郑观应等作家，在诗文、小说、游记中对华侨生活的反映。本章的第七节，着重介绍了侨乡的过番歌谣。晚清以来的过番歌谣，遍及广东各地，我们选择了潮汕、“四邑”、梅州等各具特色的侨乡，就他们的过番歌谣，作了较具体的评述，收入不少岭南晚清文学研究论文中罕见的资料。第八节论述粤讴与1905年的反美抗约运动。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引例，指出有关反美抗约运动的粤讴，内容健康，思想进步，运用粤语方言，自然明白如话，不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都从有限的笔墨中展现出无限的感情境界。它由局限于描写男女之情，进而成为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武器。

第五章又从横的方面，考察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对岭南晚清文学领域的渗透。前三节重点透过西方进化论对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在政治变革和文学改革方面的影响，揭示了岭南晚清文学崛起的外部原因，并较具体地阐明了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主张。第四、第五两节，则具体描述了在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中，岭南晚清文学领域出现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即文学翻译和旅外游记。这两节，既从两个侧面具体阐明岭南晚清文学崛起的外因，又是第三、第四两章内容的重要补充。

第六章是带有总结性的文字，将晚清岭南文学与晚清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学进行横向比较，并将晚清岭南文学置于整个岭南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来考察，从而提出晚清岭南文学的总体成就、历史地位和影响。我们认为：纵观晚清中国文学史，岭南文学家是晚清文学家群体的重镇，岭南文学作品是构成整个晚清文学创作高峰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岭南文学以其特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思想、艺术实绩，为晚清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使晚清文学各个方面的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使晚清中国文学史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本章第三节探讨岭南晚清文学诸文体的历史影响，既是前面几章内容的延伸和深化，也是第二、第三、第四章内容的重要补充。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由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近代文学研究室组织编著。管林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统稿工作。全书除前言外有六章，各部分撰稿者的分工是：前言和第四章由管林撰稿，第一章由汪松涛撰稿，第二章由陈永标撰稿，第三章由闵定庆撰稿，第五章由谢飘云撰稿，第六章由左鹏军撰稿。

6 岭南晚清文学研究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希望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深入，有所创新。但限于水平和条件，未能尽如人意，其中的不足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0年3月20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岭南晚清文学	(1)
第一节 中原传统文化与晚清之前的岭南文化	(2)
第二节 岭南晚清文化特质	(18)
第三节 晚清文化背景下之岭南文学	(38)
第二章 岭南晚清文学的发展趋势及其基本特征 …	(55)
第一节 岭南晚清文学的发展诸阶段及其走向	(56)
第二节 岭南晚清文学的基本特征	(81)
第三节 岭南晚清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负面效应……	(108)
第三章 晚清岭南文学的崛起	(119)
第一节 晚清岭南传统诗歌的新变和贡献	(120)
第二节 “诗界革命”与南社诗人	(157)
第三节 粤东词派与临桂词派	(178)
第四节 各体散文的争奇斗妍	(211)
第五节 小说新境界的开拓	(244)

第四章 岭南华侨文学的出现	(263)
第一节 晚清岭南出洋潮的形成.....	(263)
第二节 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	(266)
第三节 黄遵宪的华侨诗歌.....	(272)
第四节 吴趼人和他的《劫余灰》	(286)
第五节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的华侨生活.....	(291)
第六节 郑观应抨击买“猪仔”和反美抗约的诗文	(299)
第七节 侨乡过番歌谣的涌现.....	(309)
第八节 粤讴与反美抗约运动.....	(334)
第五章 中外文化交汇融合与晚清岭南文学	(343)
第一节 进化论与康有为政治改革、文学变革 的自我意识.....	(344)
第二节 进化论与黄遵宪诗歌近代化的探索.....	(352)
第三节 进化论思潮与梁启超文学变革设计的新思路	(361)
第四节 晚清岭南作家的文学翻译.....	(380)
第五节 中外文化交流与晚清岭南旅外游记.....	(388)
第六章 岭南晚清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400)
第一节 晚清中国文学史中的岭南文学.....	(401)
第二节 岭南文学史中的岭南晚清文学.....	(411)
第三节 岭南晚清文学诸文体的历史影响.....	(420)
主要参考书目	(447)

第一章 传统文化与岭南晚清文学

文学，应当是时代的文学。刘勰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①世情之变导致文学之变，文学作为时代生活的一种反映，作为作家对时代生活的一种体认，不可能不随世推移；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能适应和反映变化了的时代生活，其自身也不可不随时代之改变而变化发展，一种文体之兴，一种文体之废，莫不与时代变化之要求息息相关。

然而时代的变化，并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学的。一个时代的变化，往往最先表现在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方面。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的变化，作用于人群，导致社会思想道德观念、风气、价值标准、生活趣尚等一系列精神意识层面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作用于作家本人，作家亦以新的眼光来审视变化了的时代社会，于是表现新时代生活的文学生焉。

鉴于此，岭南晚清文学之研究，不可不考察岭南文化之渊源以及晚清岭南社会文化心理之变异，进而去认识和把握在这种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心理背景下生成的岭南文学的种种特

^①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

质和相应的文学现象，从中找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以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第一节 中原传统文化与晚清之前的岭南文化

在我们探讨岭南地域文化，认识它的特点、优长与不足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忽略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原文化乃是岭南文化的母胎。在我们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无论是何种地域文化，在他们的身上，都无例外地流淌着中原母文化的血脉。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载：“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又云：“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这里所说的交趾，即今之越南红河三角洲一带。而颛顼即帝位于公元前 2514 年。上述两段文字，虽不能视为信史，但至少可以说明：远在秦前，岭南已与中原存在某种文化的联系。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结束从西周到战国八百多年的诸侯割据局面而统一天下，分中国为三十六郡，而对岭南之地则别立南海尉，越人不服，起而抗秦。始皇乃于前 214 年，征发曾犯逃亡罪者、赘婿及小商贾为兵，略取陆梁之地，即五岭以南

地区，并置桂林、象、南海三郡。同时发大军五十万守五岭，经略岭南^①，与岭南土著杂居，中原文化技术传入岭南，岭南亦正式成为中国领土。在平定岭南的战争中，秦始皇还命监御史禄开通运粮水道，史禄乃在湘江上游江中筑石堤，分湘江为南北两渠，北渠北流而通湘江，南渠则经广西兴安县城西流与广西桂江上游支流大溶江汇合。南渠所经之处为越城岭山地，史禄用人工开凿渠道六十里，渠中设若干斗门，逐级提升水位，中原载重大船可自湘江上溯，经过南渠安然过山而达桂江，这是秦时开发岭南的重要航道。

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死，龙川令河北真定人赵佗代理尉职。秦亡后，天下扰攘，赵佗乃乘机兼并象、桂林二郡而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后五年（前 183），进而自尊为南越武帝。汉文帝时，朝廷派太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加以抚慰，赵佗亦自知非汉之敌，乃称臣归汉。佗于武帝建元四年（前 137）卒，三传而至南越王兴，南越国丞相吕嘉作乱，杀南越王兴、王太后及汉使，别立建德为王，武帝乃遣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率兵十余万众，自湘、赣、黔、桂分道出击；又发夜郎之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元鼎六年（前 111）擒建德、吕嘉，南越遂灭。南越国凡五世，历时九十三年。武帝征服南越后，置南越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汉元帝时，罢儋耳、珠崖二郡（归入合浦），余七郡统称为交趾，行政长官称刺史。至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复改交趾刺史为交州牧。

^①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自秦至西汉，是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影响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这可以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中得到证明。从广州象岗南越王二世文帝赵眜墓以及其他在广州、广西贵县等地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大量文物，至少可以说说明如下数点：

秦始皇在对岭南用兵的过程中，对岭南大规模移民以及灵渠的开通，对岭南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秦统一之前，岭南地区较之中原地区，生产力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在岭南地区发现先秦时期的城市遗址和聚居的村落遗址这一事实得到印证。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往岭南的以罪人、赘婿、小商贾为基本队伍的戍卒，与岭南土著杂处，不仅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铁器开始由中原输入岭南。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和西汉南越墓群中，出土的铁器种类计有锛、凿、钉、削、镊、斧、镰、锄、篾刀、剪、锥、锤、铲刀、刻刀、锉刀、钩、码钉、鼎、三脚架、刀、剑、戈、矛、镞、铤等等，而西汉南越墓群中出土的铁器较铜器为多，与广东相邻地区出土之东汉墓葬，则铜器很少甚或没有铜器。这种情况，说明尽管在吕后之时，曾有“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①之事，而西汉时期铁器的使用在岭南已趋于普遍，而且铁器开始逐步取代铜器。另外，广州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已发现陶牛、水田陶模、扶犁赶牛耕作陶俑。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在《汉征士罗公威》一篇中，也有“先世遗以负郭之田，力耕以自给，非其力不食也。邻家牛数犯其穡，威刈刍潜纳其门而去，牛家知之，感其长者，自是收检莫敢犯”的记载。正

^① 参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如恩格斯所云：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①由于铁器生产工业的大量传入和逐渐趋于普遍使用，使得在秦统一之前仍处于青铜文化阶段的岭南地区，进入了铁器的时代，加上中原牛耕技术的传入，岭南地区的生产力在西汉后期得以迅速发展。

从广州象岗南越王赵昧墓及其他南越国时期墓中出土的印玺、泥封以及器物铭文、戳印看，太夫人、右夫人、左夫人、夫人、太子、景巷令、乐府、少内、长乐宫等名号的存在，反映出南越礼乐制度与宫室官制均仿效中央政府的事实。另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兴时，汉天子“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大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可见西汉中后期，岭南地区在行政机构建制和法律制度方面，均已受到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采取了如同内地诸侯王国同样的格局。

在经济方面，根据多方面的文献资料判断，岭南地区在西汉后期，已经推行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南越灭国之后，汉武帝在岭南地区的政策是：“番禹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②也就是说对于自南海郡西至益州，北至武都所新置的十七郡，汉承秦制，采暂免征收赋税的优惠政策。至西汉平帝二年，当时全国的民户统计为12233062户，人口共59594978人，以当时的能力，这个数字当然不可能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② 《史记·平准书第八》。

确，但是，也就是这一年岭南的南海等郡首次有了户籍和人口统计数字。从历史上户籍、人口统计与赋役的摊派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测，西汉后期，初郡的“毋赋税”的优惠政策已经取消，而代之以当时内地普遍实行的“三十税一”的田税和口赋、算赋、献费等一类人头税，代替力役的更赋以及户籍税等。《后汉书·和帝纪》已有关于岭南地区税制的明确记载，说明到东汉初年中央政府在岭南地区征收赋税已是一种正常的制度了。

由于西汉武帝时期，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在京师开设太学，聘五经博士担任教官，太学正式学生为五十人，同时全国各郡均可举荐学生至太学受业，与正式的博士弟子享同等待遇。这两种学生每年均考核一次，成绩优良者委以官职。至汉元帝时，不仅太学的博士弟子数额扩至千人，同时也允许地方设立学校。由于儒家经学与仕途的结合，大大促进了儒家学术文化在全国的传播，加强了中原文化对边区的影响。岭南地区何时办学，西汉后期是否也有推荐子弟为博士弟子，现均无文献可征，但从参阅如《南越志》、《广州先贤传》、《三国志》等有关岭南地区的早期史传编撰而成的《广州人物传》所录汉代岭南人物来看，对约活动于东汉顺帝时期的番禺人董正，有如下的记载：“少有令姿，耿意术籍，年十五通《毛诗》、三《礼》、《春秋》，遂以学行知名。……贫寒不戚，志在规俗。躬耕以足衣食，暇即讲诗书，陈礼法，远近多从之游。……隐士南阳车遂闻正令名，不远千里径来投正。”细考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推断，东汉中期，儒家经籍在岭南发达地区应当已有较广泛的传播，学校的雏形应当已经出现，而且与中原地区在思想学术方面的交流应当已经开始。